

陋室汲古伴芸香——潘天祯与古籍保护研究*

周余姣

摘要 潘天祯,版本目录学家,其一生为我国古籍整理和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尚未见研究其生平、著述与贡献的专文。文章对其早年求学与从事图书馆职业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对其在古籍保护事业上的贡献进行了概括,如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倡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致力于古籍的收藏、保存和利用等。在个人著述方面,潘天祯参与了古籍研究领域内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讨论,如“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否是锡活字本”等,并积极推动对汲古阁藏书的研究,也指出了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给后人以深刻的印象。参考文献 48。

关键词 潘天祯 古籍保护 活字本 汲古阁 版本目录学

Study on Pan Tianzhe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s

Zhou Yujiao

Abstract: Pan Tianzhen, a textual bibliographer, has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are books in China throughout his life; however, no articles have been seen about his life story, writings and contribution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his early study and library career, and summarize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are books, such as serving as the deputy chief editor of *Chinese Ancient Rare Booklist*, proposing to compile the *Existing Bibliography of Rare Books of China*, and devoting himself to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are books. In terms of his personal writings, Pan Tianzhen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some pending issues in the field of rare books research, such as “Books Wuxi Hui Tong Guan printed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of tin movable type version or not”, and actively promoted the research on the JiGuGe collections, also pointed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studies, and his rigorous academic attitude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later generations. 48 refs.

Keywords: Pan Tianzhen;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Rare Books; Movable Type Version; JiGuGe; Textual Bibliography

潘天祯(1919—2004),版本目录学家,曾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获“突出贡献奖”,为我国古籍整理和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等人都获得了学界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但迄今尚未见研究潘天祯生平、著述与贡献的专文。笔者曾受命为潘天祯编写一人物介绍短词条,现依据可见的材料,拓展成篇,以概述其生平、贡献与学术成就。

1 潘天祯生平

1.1 早年求学

1919年5月潘天祯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为重庆市荣昌区),岁余丧母,家贫,父亲靠经营小本生意为生^[1](编后记)]。1938年入读成都府属联立中学(现为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该校为当时的名校。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时在重庆)历史系就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先生,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项目编号:17BTQ017)研究成果之一。

师生二人为四川老乡,且还是成都联立中学之校友。其时,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名师还有沈刚伯、韩儒林等。1945年贺昌群任系主任,同年潘天祯也毕业留校任历史系助教。该年贺昌群曾有诗《赠潘谈二君》,诗云:“于今因见古人情,情如江海义如云。五更鼓角天初晓,三巴风雨送归人。”^[2]此诗中的“潘”即潘天祯,“谈”即谈运泽,二人当时均为中央大学历史系助教。谈运泽在校时师从韩儒林教授治蒙元史研究^[3],1950年后任职湖北省教育厅,曾为湖北教育学院图书馆负责人。在校期间,潘天祯还曾与吕彼得(后来成为台湾地区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同学,二人时常饮酒,相处非常融洽^[4]。1947年初,潘天祯受贺先生指导写作的学术研究长文《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系》^[5-6]发表,论述长江流域开发史上东吴平讨山越这一值得探讨的史实,展现了其在史学研究上的成绩。

1.2 图书馆职业生涯

1950年2月27日,贺昌群被任命为国立南京图书馆馆长,3月到馆工作。潘天祯于1950年随其师贺昌群进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工作,开始其图书馆职业生涯。1954年,贺昌群北上,担任社科院图书馆副馆长,潘天祯仍留在南京图书馆工作,历任采访部兼特藏部副主任、参考研究部副主任、古籍部主任、副馆长等职。

1952年,贺昌群曾组织人员将原中央图书馆运往台湾地区的善本书籍13万册编印成《国立南京图书馆善本书草目》八厚册备查^[7],这是该馆在古籍保护事业上的一件大事,虽古籍被运往台湾地区,但编成目录至少有目可查。1954年春,潘天祯与王庸、邱克勤、钱亚新奉派前往北京学习、参观,途经济南时参观山东省立图书馆,在北京时参观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等^[8]。同年国立南京图书馆改为省馆后,为减轻该馆藏书负担,文化部等上级机关指令该馆往外调书。该年5月,北京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共同拟定了《北京图书馆选提南京图书馆藏书计划草案》,共提取了616,300册,其中

大部分是近现代书刊,也有一定数量的古籍,提书工作于1955年2月结束。提书造有目录清册4份,在清册末页署“移赠机关南京图书馆,经办人潘天祯;受赠机关北京图书馆,经办人杨殿珣”^{[9](99)}。

1956年4月,潘天祯任苏州图书馆馆长。7月参加文化部留苏研究生考试,馆务由丁肇辙代理,11月即调离^{[10](176)}。1958年9月1日至1960年4月30日,潘天祯在北京文化学院第二期图书馆研究班学习,同学中有昌少千、李文谟等人^[11]。该研究班结束后,由潘天祯执笔,结合当时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写下《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图书馆工作者的首要任务》^[12]一文。1960年,潘天祯参与点校《江苏省通志稿》,但遗憾的是该稿未获出版^[13]。1962年2月12日至21日,潘天祯陪同北京图书馆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参观镇江、无锡、苏州等地的藏书与文博机构。赵万里在其《南行日记》有如下记录:“潘天祯同志送我去车站。几天来,天祯同志对我工作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是无微不至。上车前,除向他致谢外,并请他回到南京后,向江苏省文化局周邨局长,南京图书馆汪长炳馆长、陈毅人副馆长代达谢意。”^[14]1977年,潘天祯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此时他刚刚做完胃切除手术不久。1979年至1984年,潘天祯担任南京图书馆副馆长^[15],工作更为繁忙。1979年7月13日,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潘天祯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自1980年起,潘天祯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负责子部的复审和定稿工作,后获“突出贡献奖”。

1983年10月18日,在庆祝汪长炳、钱亚新老从事图书馆工作六十年的茶话会上,潘天祯回顾了二老的贡献后强调:“我们应该学习二老热爱图书馆事业,数十年如一日为图书馆事业献出心血的工作精神;应该学习二老勇于探索,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16]事实上,潘天祯也是这样做的。南京图书馆保留的一份职员信息表上,在“潘天祯”名字的后面写着“做事认真负责,但有浓厚的优越感。”^[17]1987年,潘天祯被评为

研究馆员,全国图博六级。1992年享受国务院发放的特殊政府津贴,2000年享受有成就的老专家、老艺术家的特殊津贴。2001年初,自编文集《陋室存稿》,以《潘天祯文集》为名被收入“芸香阁丛书”和“南京图书馆百年文丛”出版。2004年1月6日,因胃癌抢救无效潘天祯于江苏省人民医院病逝^[18]。

2 潘天祯与古籍保护事业

潘天祯接受的是严格的史学教育,师从名师贺昌群。曾担任短暂的史学教学工作,自1950年进入国立南京图书馆起,从事的都是与古籍研究相关的工作,他的学术人生与“古籍”二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与古籍保护相关的主要工作如下。

2.1 担任《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

1975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做出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1977年4月,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进行编目试点工作,其后又由上海、浙江、江苏等地进行联合试点的工作,南京图书馆参与其中。1980年5月,由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和潘天祯领导的30多位编委在北京开始汇编工作。1981年1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开始编印,顾廷龙负责经部、史部,冀淑英负责集部和丛书,潘天祯负责子部。1983年4月21—28日,在安徽黄山召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主任扩大会议,潘天祯作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复审工作报告,这次会议还组成以主编顾廷龙、副主编冀淑英和潘天祯为首的10人定稿班子。为了做好定稿工作,冀淑英、潘天祯和沈燮元等在上海常住达三四年之久^[19]。对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三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如顾廷龙从74岁工作到92岁,冀淑英从57岁工作到75岁,潘天祯从58岁工作到76岁^[20]。虽年老多病,但他们将精力尽瘁于斯,让人感佩。在整个编纂过程中,江苏省的工作是进展比较快的,做到了“对善本书逐本过堂,经两个人签字,验收严肃认真,

保质保量”^[21]。曾有记载:1979年4月,潘天祯曾率领江苏省善本书验收小组到苏州市各馆验收^{[10](186)}。1986年10月23日,潘天祯与沈燮元、宫爱东应邀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发行大会和编委会主任委员扩大会议。1994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出版。

潘天祯负责的子部为上下两册,内页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样^[22]。该书著录了12,294种子部善本,分为总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小说类、类书类、释家类、道家类15大类,其下再分为各小类。各书之著录按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例^[23]要求,先书名、次卷数、次编著注释者、次版本、次批校题跋。丛书及汇编之书,子目均按照原书目录,依次胪列。书后附有藏书单位代号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利查找。一书有多个藏书单位的,一一标出。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得以问世。自此,南京图书馆在子部古籍书目编制上奠定了学术地位,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人,如宫爱东等。1994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所主持的《中国古籍总目》(子部)^[24]的编纂仍由南京图书馆承担,并由宫爱东担任总目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

2.2 倡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

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古籍整理与研究提上日程。南京图书馆的汪长炳先生结合当时的状况,也曾提出整理古籍刻不容缓^[25]。1982年,《文献》杂志组织了一次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汪长炳和潘天祯在笔谈中倡议“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趁老一代人尚在的时机,由国家统一组织编成一部质量较好的《中国古籍现存书目》,为有计划整理古籍打好基础,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条件,为后代人查考准备工具,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可能实现的”^[26]。而具体的设想是:“根据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经验,我们以为要着重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一、在中央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强有力的领导下,要建

立一个人数不多、作风正派、既懂古书编目业务、又有组织能力的专门班子,负责编目的具体组织工作;二、要大力培训一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知识、有比较顺利地阅读唐宋人文章的能力、基本上掌握古籍编目特点的干部队伍,各省都要有,这是保证编目质量,顺利进行工作的关键;三、由于历史原因或帝国主义的掠夺,我国古籍散佚在国外的不少,要通过各种渠道复制回国,寄存国外的要收回;四、邀请台湾省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士参加编目,共同为编成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古籍现存书目》贡献力量。”^[26]该建议提到海外中华古籍的回归问题以及联合台湾地区的力量编目,非常有远见,但限于条件,当时未被采纳。直到1992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上,与会者又提出应着手编纂《中国古籍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并由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持。2013年,《中国古籍总目》终得出版,汪长炳、潘天祯这一倡议才最终实现。

2.3 为图书馆做好古籍及其他文献的收藏、保存和利用工作

1967年,南京图书馆得悉镇江一家造纸厂准备将各单位清理送交的大批旧书化为纸浆,即派潘天祯、纪维周、朱隼、杜信孚等4人前往挑选,后从堆积如山的旧书刊中,挑选出旧平装书、古籍等分装三卡车运回馆内整理入藏^{[9](98)}。潘天祯还曾为南京图书馆购买重要古籍多种,如1992年促成南京图书馆以40万元人民币购买苏州顾氏过云楼藏书,共500余部3000余册,并完成了该藏书的部分编目整理工作^[27]。实际上,1991年秋南京图书馆即购得顾氏过云楼藏书541部^[28]。

为做好古籍的保护工作,潘天祯从1950年就关注过古籍修复工作。文革后,潘天祯将邱晓刚引入古籍修复的领域^[29],并向修复国手张士达举荐邱晓刚、杨来京、毛俊义,使邱晓刚等得以成为张士达之关门弟子和一代修复能手。在古籍利

用方面,潘天祯为太平天国史料编委会、农业遗产研究室、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等多个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提供专题资料,受到广大研究人员好评^[30]。此外,对于其他文献利用需求,潘天祯也予以方便。据孔夫子旧书网一份材料显示^①,1965年6月12日潘天祯应《农业机械文摘》编辑室请求,帮忙核对南京图书馆所藏1962—1965年有关杂志、论文集的目录。

3 潘天祯著述述略

潘先生勤于笔耕,为文多为万字以上的长文,其论著多系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编目实践中认真思考、仔细推究而来。《潘天祯文集》收入了其大部分论文,翻阅该文集可知其所关注的领域主要是书史、藏书史和印刷史等,有小中见大、考订精细、论据充足等研究特点。

3.1 关于“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否是锡活字本”论争

潘天祯治学严谨,不著一字空文,多考证之文,如考证无锡会通馆是锡活字,反复论证。早在1958年,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在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文中提出:“至于明朝是否沿用锡活字印书,文献未详。不过《华燧传》有‘范铜板、锡字’一句,华氏会通馆除铜字外,似乎也铸过锡字。”^[31]但限于资料,张先生未能坚持己说。潘天祯在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过程中,对古代活字印本进行过一些探索。他认为:“古代的铅活字印本,大致已经失传;至于锡活字印本,不但没有亡失,而且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汉文活字印本。”^{[1](55)}他于1979年撰写的《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以四篇不同的华燧传记为主要论据,证明锡活字本的存在。该文发表后,张秀民先生曾与之往返商榷,潘天祯又著有《再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三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答张秀民先生》二文反复申说。后还曾于2001年撰《四谈

① <http://book.kongfz.com/15045/632642926/>

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华燧锡活字印书的探索始末》，并质疑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中的观点。但潘天祯的观点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曹之认为“潘氏不因袭旧说，自成一家之言，精神可嘉，然有以下数端可商榷”^[32]，不赞同其说；同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的冀淑英也认为“华氏会通馆的印本为铜活字印本”^[33]。

由于古代印刷的实物和工具较为缺乏，相关的研究只能凭借一些零星文字记载，学者们在此方面的研究要取得确证极为艰难。潘天祯曾对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提出较多问题^[34]，张秀民曾予以回应^[35]，潘天祯又予以再商榷^[36]。上一代学者治学严谨多类此，如张秀民先生对于雕版印刷开始于唐初贞观说，也曾曾在十年间通过再论、三论加补记的方式不断申说论证^[37]。对于“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这一观点20余年的坚持，潘天祯也曾说明其心路历程：“当时编辑怕引起论争，要求删掉，笔者未允。确如编辑所料，拙文发表二十多年来，获得许多学者的关注，引起不少争论，笔者又写了《再谈》和《三谈》，现在面对的是《明代出版史稿》这部大著……笔者年逾八旬，体弱多病，查书也不方便，只能在陋室再写一点，作为《四谈》……”^[38]当然，潘天祯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从华燧墓中发掘出当时的活字实物，或用现代科技检验出印本上的金属品种，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了”^[38]。其治学的严谨、孜孜求证可见一斑。他指导的函授学生徐苏回忆了他指导论文时说的话：“糊涂呀！研究要以论据说话，不是以推论说话。论文怎么能这样写，不作深入的研究，搜寻有说服力的实证，用统治者不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样的推论，就能作为活字印刷术发展缓慢之因的结论吗？你是混论文，而不是做论文！”^[39]这充分体现出其治学的严谨态度。2007年，“南京图书馆百年文丛”系列的同仁文集将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收入^[40]，可见学界同仁仍认可此文为其代表作。

3.2 对汲古阁藏书的研究

明代的汲古阁在我国藏书与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阁主人毛晋不仅藏书，而且还刻书、抄书，使汲古阁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名词。有鉴于汲古阁在我国书史上的地位，潘天祯特别注意对汲古阁及相关人士的研究。他认为“明清之际，常熟毛氏汲古阁是我国突出的私家出版兼藏书事业的室名，历时约百年，中外鲜有。起万历之季，毛晋创业，迄顺治十六年晋卒，垂四十年。主要继承者是晋幼子毛扆，享高寿，终生从事校补家刻，访求传抄宋槧名钞，至康熙五十二年阁业始衰。可惜迄今无一部系统的汲古阁史，是我国书史的遗憾，有待补撰。”^{[1](282)}为此他的研究涉及毛晋、毛扆等人的生平事迹、汲古阁藏书的去向、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研究等等，较为深入。潘景郑在校订毛晋《汲古阁书跋》时也曾为毛晋子孙搜辑部分遗文，搜辑毛扆二十六篇^[41]。潘天祯在此基础上广肆搜稽毛扆书跋，共得百篇，按四部排列，略加附注，注明出处，辨析出《诗经阐秘》等三种是伪跋^{[1](282-327)}。这也是潘天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汲古阁研究的贡献。

对汲古阁的研究是书史和印刷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专题，如今也得到较多年轻学者的注意，不少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如赵鑫的《毛晋毛扆书跋研究》^[42]；也有相关的研究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近几年的“汲古阁藏书、刻书、抄书研究”“汲古阁刊刻集部书籍研究”“汲古阁汇纪”等研究，假以时日，当可朝着潘天祯所谓的“系统的汲古阁史”前进了。

3.3 为前人研究指谬

据徐忆农回忆：“潘先生常说，有问题的东西才值得写，并强调要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迷信所谓‘权威’的说法。他时常向我们介绍老一辈史学家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先生的治学方法，尤其赞赏陈寅恪先生主张的搞学术研究要有‘独立之精神’。”^{[1](编后记)}诚如所说，在潘天祯的学术论文

中,多辨析考证之文。其另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是《扬州诗局杂考》。潘天祯于1982年春节开始起草该文,8月改稿,10月以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次科学讨论会论文小册子形式印刷,论文编号为第59号。后正式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1983年第一期上。文中根据曹寅、李煦两家档案及有关史料,介绍了扬州诗局的始末及刻书情况,对所谓“殿版”“康版”作了考证,指出了金植、陶湘、谢国桢之误^{[9](235)}。1993年,潘天祯还曾撰写《〈扬州诗局杂考〉后记》,继续跟进该研究,前后历十余年。又如学界有观点认为^{[1](111)}“《萝轩变古笺谱》约早于《十竹斋笺谱》十九年”“《十竹斋笺谱》是受《萝轩变古笺谱》影响”,潘天祯经过认真分析,提出“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仅凭笺谱序年先后,将短版与拱花的发明创造归之萝轩,显然证据不足;反之,认定应属胡正言,也欠更确切的证据。”^{[1](116)}其他如对《容斋逸史》的作者洪迈进行订补^{[1](22-34)},在张静庐的基础上考订中国近代第一份女报——《女学报》^{[1](196-200)},商榷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1](35-54)},质疑谢国桢仅凭天一阁藏本《杏花村志》扉页所钤印的“金陵十竹斋发兑”就认定“是书由金陵胡曰从十竹斋开雕刊刻”^{[1](108-122)}的观点等等。潘天祯心细如发,为学颇有老吏断狱之风,有疑处决不放过。在论文中,潘天祯主张言必有据。其行文中常见有“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可以,但不能作为印刷术发明时间的可靠依据”“作为旁证可以,仍不是直接的可靠证据”^[36]。因此,在论述中,潘天祯也很注意提供证据,常道“因未见原书,不便讨论”。为此,他尽可能在其论文中提供相应的影印件以为说明。如其在探讨《题奏事件》时附录了“《题奏事件》乾隆三十八年版”“南图藏公慎堂活字印单张”几种活字影印件^[43],以为凭证。潘天祯还补充了对胡正言、毛扆的家世生平的研究,丰富了我国印刷史的人物研究。

潘天祯的这些研究,跟南京图书馆丰富的古籍特藏有莫大的关系,如该馆的馆藏精品有明代活字印本《壁水群英待问会元》、明活字本《晏子春秋》、清道光二十六年翟金生泥活字印本《仙屏

书屋初集诗录》等;明代彩色套印版画的代表作《十竹斋书画谱》、清芸叶盒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伋刻三色套印本《楚辞》等;明“汲古阁”刻本《筠溪牧潜集七卷》、“汲古主人”递藏的明代抄本《乐府雅词三卷拾遗二卷》以及中国最早的妇女报纸《女学报》等^[44]。由此也可看到,研究必须建立在丰富的文献的基础上,不能有任何投机取巧的想法。

4 结语

关于潘天祯先生的著述,辛德勇曾评价“个别学者如江苏的潘天祯(祯)先生,虽然提出过很好很重要的新见解,但却根本不被撰述通论性著述者特别是那些研究印刷史和版本史的大专家所理睬。”^[45]这也是让人比较遗憾的地方。笔者认为可能跟潘先生所做的研究多是纠谬,未能建立系统的体系以及总体上著述相对较少有一定的关系。充当“学术警察”,固然可以纠谬拨乱,但于系统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有所妨碍。总体著述相对较少,是因为潘先生非常严谨,分外注意个人学术论文与集体产物的分界线,正如他所言:“工作上的问题,和有关同志共同处理,所写材料,不辑入此稿。工余探索的问题,苟有所得,写成小文,与学界交流,虽尝尽绵薄,实不足以言著作。”^{[1](自叙)}“《书目》(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乃集体编辑,理当统一著录,参加工作者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不能各行其是,这和学术讨论是两回事。”^[46]经这样严格的筛选,属于个人著述的部分自然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潘先生的一些学术考证,如对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刊刻情况的推测,也获得了学者的认同^[47]。在编制完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之余,在一些学术问题上自出机杼,坚持自我,潘先生独立的学术精神、严谨的学术态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行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与保护事业蒸蒸日上,对古籍整理与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物理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巧合的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两

位副主编,冀淑英为赵万里(字斐云)的弟子,潘天祯为贺昌群(字藏云)的弟子,都是笔者所要研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48]的传人,称他们为“平馆学人二代”实不为过。赵万里先生还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顾问之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芸香阁丛书》收入顾廷龙、赵万里、冀淑英、潘天祯四人的文集,四人分别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顾问、主编和副主编,赵、冀、潘还是笔者所谓的“平馆学人及二代”。“遗编—读想风标”,笔者走笔至此,似可想见在一片芸香之中,潘天祯在其“陋室”中摩挲古籍,尽显“汲古”之雅意。本文拟抛砖引玉,希冀学界同仁对潘天祯其人其学开展更多的研究。

致谢:本文承南京图书馆研究部研究馆员徐忆农女士审阅并提供相关信息,特此申谢!

参考文献

- 1 潘天祯.潘天祯文集[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 2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3卷文论及其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28.
- 3 谈运泽.追忆三则[G]//陈得芝,等.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5-76.
- 4 沈津.一掬笑容何处寻,千秋矩矱仰前形[G]//沈津.书海扬舲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1-18.
- 5 潘天祯.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系(一)[J].读书通讯,1947(131):8-11.
- 6 潘天祯.东吴之开发与山越之关系(完)[J].读书通讯,1947(132):6-24.
- 7 乔象钟,许荏华.著名史学家贺昌群先生[G]//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南雍骊珠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
- 8 钱亚新.钱亚新别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305.
- 9 卢子博.南京图书馆志 1907—1995[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
- 10 徐雁,许晓霞.苏州图书馆百年回眸(1914—2014)[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4.
- 11 湖北省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 1904—1984[M].武汉:湖北省图书馆,1984:196.
- 12 潘天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图书馆工作者的首要任务[J].图书馆学通讯,1960(6):27-30.
- 13 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19.
- 14 赵万里.赵万里文集 第二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535.
- 15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志续编 1996—2005[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56.
- 16 祝贺汪长炳 钱亚新两同志从事图书馆工作六十年 南图、省学会举行茶话会[J].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53-60.
- 17 韩雨霖.南图晒出钱钟书当年的工资表[N].现代快报,2017-12-02(F5).
- 18 佚名.潘天祯先生逝世[J].新世纪图书馆,2004(2):73.
- 19 顾廷龙.顾廷龙全集 文集卷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363.
- 20 骆伟.春华秋实——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历程[J].图书馆论坛,2010(6):284-288.
- 21 谭祥金.誓将总理遗愿化宏图——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纂工作进入总编阶段[J].图书馆学通讯,1980(1):26-30.
- 22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全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2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编例.
- 24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5 汪长炳.整理古籍刻不容缓[J].江苏社联通讯,1982(1):6-7.

- 26 汪长炳,潘天祯.建议编辑《中国古籍现存书目》[J].文献,1982(1):17-18.
- 27 叶建成.过云楼[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173-174.
- 28 徐忆农.宋绍定三年钱塘俞宅书塾刻本《乖崖张公语录》[N].光明日报,2013-07-02(013).
- 29 邱晓刚.张士达与《蟠室老人文集》[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4):93-94.
- 30 《江苏文化年鉴》编纂委员会.江苏文化年鉴2004[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4:218.
- 31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69-70.
- 32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572.
- 33 冀淑英.冀淑英古籍善本十五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168.
- 34 潘天祯.唐、五代江苏印刷史料校释——读《中国印刷史》札记[J].江苏出版史志,1992(1):108-113.
- 35 张秀民.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M]//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年鉴1993—1994.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4:334-335.
- 36 潘天祯.《对读〈中国印刷史〉札记的商榷》之商榷[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6):29-32.
- 37 张秀民.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C].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32-50.
- 38 潘天祯.四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华燧锡活字印书的探索始末[J].江苏图书馆学报,2002(2):45-49.
- 39 徐苏.把冷板凳坐热——一个图书馆员的感悟[J].新世纪图书馆,2012(12):85-88.
- 40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同仁文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32-238.
- 41 [明]毛晋.汲古阁书跋[M].潘景郑,校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序言.
- 42 赵鑫.毛晋毛扆书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8.
- 43 潘天祯.乾隆、嘉庆年间所印日报《题奏事件》的发现[J].文物,1992(3):82-91.
- 44 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记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45 辛德勇.咸丰九修《毘陵徐氏宗谱》在中国古代的铜活字印本问题[G]//宫晓卫,韦力.藏书家珍藏本11-13合订本上.济南:齐鲁书社,2014:119-120.
- 46 潘天祯.再谈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J].北京图书馆馆刊,1993(Z2):65-70.
- 47 林宏佳.《汲古阁说文订》写作模式试探:兼谈汲古阁《说文》的评价[J].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十一辑),2013:242-267.
- 48 周余姣.以书为师,因业成缘——国立北平图书馆学人群体研究述略[J].图书馆,2018(1):41-47,58.

(周余姣 副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

收稿日期:2019-02-18